
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

——“自由主义者、新左派争论”的背后——

兴梶一郎

〈KOROGI Ichiro, 神田外语大学〉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间的争论在最近几年受到中国国内外的注目。两者间的争论并不光是学术争论。它的背景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社会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是什么？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化？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对到现在为止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争论。两者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争论的中国的现实是什么？从此中国面向什么方向？

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主张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间的争论背景里，首先有“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化”的问题。中国虽然连续保持令人眩目的经济成长，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农村的疲敝、失业等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出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权力构造依然存在的同时，因为只有经济的市场经济化，政治明显介入经济的倾向愈加强烈。拥有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们垄断经济活动的“官商”现象有所抬头，不公正感愈加强烈。这就是所谓的“权力的市场化”。

面对这种事实，使对长期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出现分歧。80年代因为经济改革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大众间未出现太多的不同意见。但是90年代开始，利用特权的人们愈加富有，烦恼于收入减少和负担增加的农民及下岗工人开始出现不满。结果在思想界也出现了围绕市场经济化的不同认识。这就是产生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争论的背景。

自由主义者主张，造成经济改革的问题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治引起的。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不受任何威胁的绝对权力没有约束，权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垄断使用社会资源，才鼓动了人们捞取不法财产。同时，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未得到保障也是一个原因。例如自由主义者的徐有渔写到：

“自由主义认为保护个人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因此，需要对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制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滥用与经济权力的垄断、滥用密不可分”。¹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贫富差距和腐败等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旧权力体制和市场体制同时存在，前者蚕食后者，扭曲后者”。² 因此，他们指出成功实现市场经济化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树立权力监督体制，实行宪政政治。

新左派则认为“市场经济化”是造成不平等和腐败的原因。因此，对自由主义者赞同的市场经济化采取否定态度，向往毛泽东时代。他们采用西欧新左翼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希望能在中国被指责为大失败的毛泽东“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新左派一员的汪晖指出，“从一定的意思来说，市场社会本身造成了难于克服的矛盾”³。崔之元主张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再评价，“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树立了重要的基础。首先，土地的集团所有给农村的民主自治带来了有利的前提”。⁴关于文化大革命，他也指出，“应该将毛泽东所说的‘7—8年搞一次文革’制度化，定期地在全国进行直接普选。只有这样才是人民民主专政”。⁵

这种两者的立场来自于对中国现状的不同认识。因此，我们如要对双方争论进行评价就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第1，造成不平等和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的现状如何？第2，中国是否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

首先中国的现状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状中产生了诸多的矛盾。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明显的“官支配民”的社会。在中国用“官本位”这个词，这里“官”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方面，虽然私营企业正在继续成长，国有经济继续向私有经济转型，但并不那么简单。犹如中国报张频繁报道的一样，私营企业因与政府发生摩擦而被剥夺发展机会的事件并不少见。

比如重庆市的陈兴萍经营的屠宰场由于销售比较好而被政府相关人员妒嫉，他们使用多种名目课以大量的罚款，最后使之倒闭。随后政府相关人员自己经营屠宰场并垄断了市场。⁶这种例子在中国并不为少。最近连续发生了河北省徐水县的孙大午和辽宁省沈阳的仰融等私营企业家与政府发生摩擦后，或被逮捕，或被通缉的事件。

同时，私营企业由于存在着各种市场准入的障碍，不能进入国有企业或与之拥有合作关系的外资企业所垄断的领域，不能进入金融、电信、教育、公共交通、航空、铁道、用水、证券、石化、基础建设相关部门。⁷融资方面也是国有企业独占七成，私营企业因资金的不足而烦恼。上海的周正毅事件等私营企业的非法融资事件的频繁发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那么，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长期不衰呢？

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强权政治体制下进行的经济发展。政治权力帮助资本获得利润，亦或直接收敛资本。计划经济虽然应该已经结束，但政治体制并未改变。这是一种和以前同样的单极集中。因此，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变得密不可分。⁸具体来说，政府部门或政府相关人员、亲戚或家属利用政治特权垄断商业。其结果是一部分的人变得富裕，产生贫富差距。只要看一眼政治腐败愈演愈烈的事实就会一目了然。

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吗？

下面，移至第2个争论点的“中国果真是资本主义社会吗”。

新左派认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化产生不平等和腐败等现象，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只不

过还处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阶段。

严格地说，中国的经济体制连社会主义都不是。比如，看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就会明白。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的生活很惨淡。邓小平时代，农民的生活由于生产承包制的实行一时得到改善，但现在仍然苦于收入的减少和负担的增加。

农民不是医疗保险、年金等社会保障的对象。生病后因为没有保险，一般只能选择借大笔的钱来治疗或等待死亡。毛泽东时代虽然一时存在着被称为合作医疗制度的集体保险，但水平很低。现在是完全自费。最近由于土地价格激增，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的开发商低价强制性地收购，造成了很多损害农民利益事件的发生。

工人在毛泽东体制下的生活比较安定，但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下失业者增加，生活条件愈加恶化。从农村来的民工的权益也经常侵犯，由于拿不到工资而试图跳楼抗议的事件也曾经被报导过。最近在贵州省贵阳市，刚发生16名女工试图跳楼自杀，被警察成功解救的事件。⁹ 工会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员的数据表示劳动纷争的年增加率为50%。去年仅限于被受理的违法事件就超过5万件。¹⁰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为前提构想了社会主义。从此观点来看，中国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处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近年在农村急剧增加的“地价上升”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勃兴期的“圈地运动”的翻版。

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中国的资本主义好像和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更加相像。比如说“官商”现象的蔓延是它的典型。政府官僚兼任企业经营者的地方也不少。最近成为报纸话题的是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的例子。他也兼任着奇瑞汽车的总经理。¹¹

在其他地区，政府相关人员与商业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也不少。也存在行政改革中下岗的公务员在政府成立的企业再就业的事例，形成了政府保护这种企业，使民间企业家无法施展才能的局面。

四川省虽然下发了禁止公务员兼任企业经营者的通知，但政府部门而不是个人进行企业的经营本身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的解决决非易事。¹² 此外，官僚本身经营商业的例子也很多，家族利用官僚的特权得到利益的类型较多。例如父母从政，子女经商的“一家两制（一家二制度）”。在官僚或熟人等特权阶层垄断经济利益的情况没有变化。建国后共产党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将其改造成国营企业（现在的国有企业）吗？而半个世纪后历史又“返祖”了。

那么，这些问题只是市场经济化（资本主义化）带来的吗？不是。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特权。新华通讯社的前记者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毛泽东体制下的1956年的上海已经存在供共产党高级干部等特权阶层使用的医院，也有可以便宜地买到高级商品的不挂招牌的商店。

同时，著作回忆在北京秘密地举办着舞会和电影放映会，高级干部可以得到特殊物资的供应，家属也可以乘坐高级轿车。在农村，党干部掌握渡船坞的经营权，向交纳手续费的国营渡船公司优先提供客人，并且发生过作为竞争对手的民间经营的船老板被扔进河里的事件。此干部在整修自己的住宅时也曾经不付报酬给劳动的农民。¹³

指出在革命圣地的延安即已存在特权而被毛泽东肃清的作家王实味的经历非常有名了。¹⁴

毛泽东时代绝对不是理想时代。这种特权阶层在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利用市场经济化，将政治权力“货币化”，成为富余所层的例子也不少。毛泽东时代、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比如，经济学者王亚南（1901—1969年，历任厦门大学教授等）在半个世纪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曾写到：

“官僚资本本来是利用政治特权，垄断所产生的。没有垄断利益，没有依赖政治权力得到的差别待遇就不能维持。因此，为了维持扩大官僚资本，就有必要扩大垄断权，扩大政治权力。……官僚以垄断或统治的经济事业为政治性资产”。¹⁵

王亚南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他指出“专制官僚统治一定会产生官、商、高利贷者、地主的四位一体，产生集权性或官营经济形态。同时也会产生腐败无法的风潮”。¹⁶ 换句话说，笔者认为就如“升官发财”这句话所反应的，在“当官”“发财”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延续性正是问题所在。

结 论

那么，如果对上面的现状把握正确，对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应该作出怎样的结论呢？

自由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是问题的根源，提倡建立宪政政治。言论、结社自由、多党制政治、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价值是他们的理想。新左派则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怀疑，抱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倾向。

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正的愤怒，对于何为原因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由主义者在一党专制中寻找原因，新左派则在市场经济化中探索原因。但是，相对自由主义者明确地以宪政政治的实现为目标，新左派则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他们以对资本主义化的批判为主，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体质改革的方向。

若将现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定义为资本主义初期阶段，那么主张应该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构造的自由主义者比较有说服力。新左派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前提出发，展开反资本主义性的议论，从某种意思来说，与极端地警戒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修正主义化）的毛泽东极其类似。

毛泽东虽然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化倾向，但未能提出作为代替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他甚至反对马克思的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他向往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呢？

当然自由主义者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其理论无论如何正当，在现实中国中会被解释成什么样子的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化相适应，在此点上虽然与政府当局的方针无较大区别，但围绕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由于触犯了一党专制政治的权力利益，而受到政治上的压制。¹⁷ 对于以宪政政治为目标的修宪议论，政府也已经发出禁令，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依然受到防犯。

新左派“市场经济化带来贫富差距和腐败”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对于中国的民众特别是未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农民和劳动者来说，确实有很强的说服力。民众对毛泽东的强烈支

持，给新左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支持“经济自由”主张的资本主义者对于不能享受改革恩惠的人们来说，被认为有容忍腐败和不平等的倾向。

今后，如果共产党继续采取“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立场，市场与权力的融和将变得更为严重，有可能成为特权阶层的家族及其熟人支配经济的“亲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中国也开始有人担心中国的拉丁美洲化和印尼化了。

像不动产投资的过热和开发区热潮一样，政府与开发者联合投资，银行进行政策性融资的方式很普遍。已经处于供给过剩状态的中国经济在投资热潮结束时，将诱发不良债券和金融危机的可能。这种畸形投资结构无视效率，是只追求政绩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果经济发展也在专制体制下产生较大矛盾，这个事实已经在亚洲货币危机中得到证实。

最近，在中国各地已经出现各种形式的民主化变化也是事实。比如，今年5月在深圳市富田区，没有登记在政府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重庆市农村开始“镇长直接选举（镇是末端行政单位，与乡相比工商业的比例较大）”的探索。今年1月的湖南省岳阳市市长选举中也发生了候选人落选的意外。但是，抵抗这种变化的力量依然较强，重庆市的镇长选举因为上级县政府的介入而被迫中止，岳阳市的落选市长最终还是在第2次选举中当选。¹⁸

不管如何，中国现在应该选择的道路是，从旨在富裕一部分特权阶层的“特权资本主义”转向全体国民富裕的“民主资本主义”。因此，需要进行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政治改革。不然，“经济自由，政治专制”路线无法对应贫富差距和腐败的恶化，并导致民众不满的高涨，或还可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专制，政治专制”。比如，对回归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作家王力雄认为：

“存在于中国底层的毛泽东情节和社会表面下的动向非常危险。不久的将来，重叠累积的中国社会的矛盾可能以毛泽东思想为幌子，从社会的底层开始爆发。它不但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会导致社会动乱”。¹⁹

王先生认为，没有民主主义经验的国民很可能诉诸于文化大革命式的大众民主主义，他们憎恶官僚，对有钱人发起没收财产和企业的“经济文化大革命”。同时，如果发生动乱，那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问题时，“经济危机成为契机的可能性很大”。²⁰

中国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方面的民主化。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中能否实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在进行适合市场经济的政治民主化，和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同时，有必要提供支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这张安全网的市场经济化只能扩大贫富差距和更加激烈的对市场经济化的否定。近年一般市民的爆炸事件就反映了不存在解决深刻的社会矛盾所必要的“安全阀”这个现实。在中国欠缺公正的司法制度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收制度等有效的社会调节机能。²¹

重要的不是向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统治经济体制下的表面公正和平等“后退”，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平等。这个过程中，从一党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换是不可缺少的。

一党专制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导致腐败，成为银行的不正融资、地方政府的过

剩投资，无规则的经济活动等的原因。一旦供需间的均衡崩溃了，银行的不良债券将进一步增大，政府的财政赤字发生恶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也就是说，妨害中国经济安定发展的是“政治”，没有政治的改革，也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经济自由，政治专制”迟早要面对这个矛盾。

1 徐有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页。<http://www.usc.cuhk.edu.hk/wkqp.asp>。

2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崔之元〈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同上。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

5 《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刊载。徐有渔《三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被注2《思潮》引用。徐的论文也可以从<http://www.usc.cuhk.edu.hk/wkqp.asp>取得。

6 《天府早报》2003年8月。转载于《人民网》2003年8月13日。

7 杨大楷、肖焯〈启动民间资本扩大国内需求〉《财政研究》2003年第3期。

8 仲大军、程晓农〈中国工业化的缺陷及经济增长的代价——20年来改革历程之检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页《经济与社会观察》评论第7期2003年7月6日收。<http://www.dajun.com.cn/zengzwt.htm>。

9 新华网网页〈贵阳16名女孩讨工钱要集体跳楼被警方成功解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26/content_1101891.htm。

10 孙亚菲〈状告工会第一案〉《南方周末》2003年9月6日。转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11 范利祥〈安徽红顶商人调查〉《中国经营报》2003年6月16日。

12 王进昌〈给官商一体划句号〉《中新网》2003年7月30日。

13 戴晴著、横泽泰夫译《神格化と特权に抗して——ある中国“右派”记者の半生》（中国书店，2003年）。

14 戴晴著、田畑佐和子译《毛泽东と中国知识人——延安整风から反右派斗争へ》（东方书店，1990年）。

15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6 同上。

17 李蔚欣〈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复兴〉《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2期。<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20212&total=77>。

18 郭中军〈王亮当选——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端倪初现〉《政治学研究网》<http://www.pssw.net>，侯少文〈人大制度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了望》2003年9月8日，〈城口县坪坝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纪实〉《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19 王力雄〈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潜动〉《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305&total=70>。

20 同上。

21 唐建光〈个体恐怖犯罪威胁中国社会〉《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9月1日。

（邵伦 译）